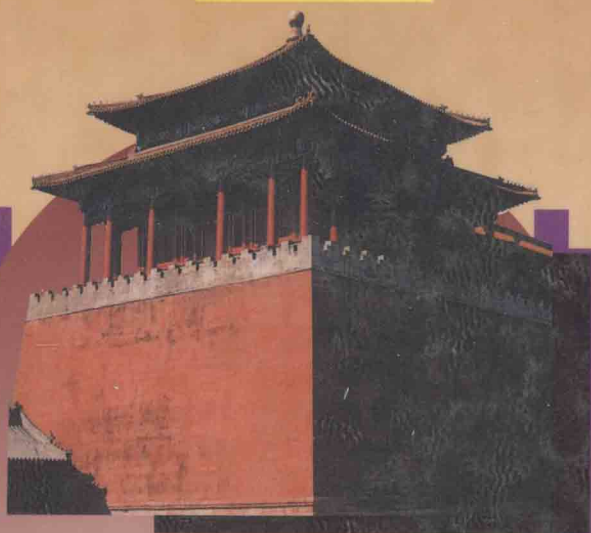


資政要鑑

第一卷



赵禄祥 主编

北京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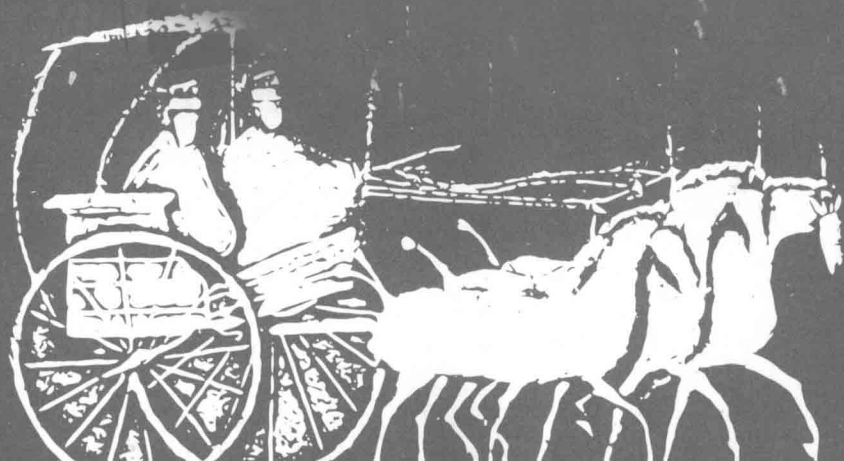


赵禄祥 主编

资政要鑑

第一卷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政要鉴/赵禄祥主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 8
ISBN 7-200-04089-4

I. 资… II. 赵… III. 国家—行政管理—经验—中国—古代—鉴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7801 号

资政要鉴

ZI ZHENG YAO JIAN

赵禄祥 主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9 印张 2 880 000 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200-04089-4/K·422

(1—4 卷) 定价: 230.00 元

《资政要鉴》编委会

主 编:赵禄祥

副主编:(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宝珠	王兰锁	王怀志	王建吉
王朝中	田人隆	李世愉	李学东
李雪屏	杨军强	杨祥峰	武四海
林吉旺	岳会仁	饶江山	黄晓东
商 传	梁海俊	谢保成	翁殿璧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钊	马宝珠	王兰锁	王怀志
王建吉	王政尧	王朝中	田人隆
刘 驰	李世愉	李华瑞	李学东
李雪屏	杨军强	杨祥峰	张小也
陈 爽	武四海	林吉旺	罗燕生
岳会仁	孟彦弘	赵禄祥	饶江山
黄晓东	商 传	梁海俊	谢保成
翁殿璧			

自序

赵禄祥

(一)

《资政要鉴》是继《国史镜鉴》、《治乱警鉴》之后出版的第三部史鉴著作。至此,“中国历史三鉴”终于全部编撰完成了。

自从1980年设想编撰史鉴著作,并为此进一步重新研读二十五史等文献典籍,到1990年整理出二千多个条目,其反复思考和酝酿准备的时间整整延续了十年。从1990年7月开始组织编委会,由我主持编撰《国史镜鉴》,到1993年出版;接着主持编撰《治乱警鉴》,到1996年出版;随后主持编撰《资政要鉴》,到2001年出版,其编撰和出版的时间又整整用了十年。古人云:“十年磨一剑”。“中国历史三鉴”用二十年心血锤炼打磨,其作品是否成功,读者是否欢迎,自有世人评说。对我个人而言,完成了平生

的夙愿，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现代化事业尽一点微薄之力，也就足以感到无限欣慰了。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①“以史为鉴”、“以鉴为师”，“鉴以资政”、“鉴以资治”，正是我主持编撰“中国历史三鉴”苦心孤诣、孜孜以求的目的。为此，“三鉴”中的每部史鉴都经过了长时间的反复酝酿，从历史、现实到未来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思考，而《资政要鉴》是酝酿时间较长、难度较大但创新颇多的一部。从1994年开始，在《国史镜鉴》已经出版、《治乱警鉴》正在紧张编撰时，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商传、李世愉、田人隆、谢保成先生，以及北京出版社责任编辑王兰锁先生等，就一直在考虑《资政要鉴》的编撰问题，酝酿的切入点是从“三鉴”最初设想中的“社会史鉴”入手，进行创新，编撰一部新的史鉴著作。当时虽未确定书名，但对此书的框架和指导思想专门开过几次会议进行研讨。1994年11月，因工作需要，我离开秦皇岛调任邯郸市市长，每天有大量繁重的实际工作压在肩头，利用

^① 江泽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束式上的讲话》。

星期天或节假日召集编委集中开会研究问题的时间少了,因而组织编撰的步伐慢了,但我仍没有放弃和停止对《资政要鉴》一书的思考和探索。特别是1995年盛夏,利用参加海峡两岸史学家北戴河会议之际,专门请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高华、李祖德、李新达、孟世凯等专家、学者又开过一次会议,对以前从“社会史鉴”的角度进行编撰的思路进行了拓展,之后又反复综合、归纳、比较,苦苦思索,于1997年正式制定了编纂体例和编撰大纲。这期间整整用了4年时间,可以说是走了一段“漫长”的路程。其后又经过编委、作者两年多的努力,完成了《资政要鉴》的编撰工作。

《资政要鉴》的内容,是根据编纂体例和编撰大纲的要求,经过仔细精选而形成的。它分为四卷,即政治卷、经济卷、文化卷、社会卷。每卷又列出了40个左右的专题,总计169篇,近400万字。

《政治卷》的内容是围绕统一与分裂、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两个基本问题展开的。先秦部分,我们论述了民心向背与殷周兴亡的关系,检讨了变法运动与战国历史的大变动,以及各国变法成败与国家兴亡的关系。

秦朝与汉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时期,围绕这一历史特点,我们论述了有关的各个具体问题,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特点、官僚制度以及官僚机构运作的机制、法制建设对加强统一和中央集权的重要性。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时期,历史呈现了新的特点,如何理解统一与分裂的转换,如何评价分裂时期的历史和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大趋势,成为我们首先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还论述了与门阀士族结构相应的用人机制以及选官制度。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状态,却又很快消亡了。继起的唐朝的兴盛气象,使唐朝成为媲美汉朝的又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而在中唐之后,社会政治出现了激烈的动荡,及至晚期,更陷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状态。这种治乱与兴衰、统一与分裂转换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成为我们必须作出解释的重要问题。《隋朝的统一与速亡》、《从贞观之治到武则天专政》、《唐玄宗时期的治乱更迭》、《唐后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唐朝的宦官专政》等文章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朝积贫积弱给后世留下了深刻而痛切的印象,这一历史特点从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政治和外交的互动中彻底显露出来。

本卷论述了宋朝与辽、金、西夏的和战外交，以及这些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因改革而强盛的历史过程。继宋、辽、金、西夏的对峙之后，元、明、清三代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大帝国，政治体制与各项制度建设也臻于完备，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封建王朝进入了最后的衰亡阶段。我们试图从成吉思汗的统一、洪武盛世、叶淇变法至张居正改革、城市民变、清朝内务府的设立、回避制度、廉政建设、统一台湾与土尔扈特回归，以及闭关政策、晚清外交等问题，去探讨历史的转换及其机制，并试图揭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内在原因。

《经济卷》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及历代王朝的经济政策进行客观的、历史的分析，力图从史鉴的角度给人以启迪。本卷不但描述了各个时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大致面貌以及所达到的技术水平，如夏商周三代、战国时期、秦汉时期经济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腾飞，及至清代区域经济的发展等，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及其广度的拓展对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影响，并具体论述了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产业，如农业、手工业、商业、畜牧业、对外贸易等

等。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文章还专门论述了历代封建王朝从赋税、财政、工商业政策、土地政策、人口政策以及经济管理、经济改革等多个侧面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所作的调控及制约。这些内容无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有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才能国泰民安,长治久安;反之,经济得不到发展,人民的生活就得不到保障,社会就会动荡,国家就会贫弱,而“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对于我们今天“四化”建设、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文化卷》论及的内容,集中在社会思潮、思想的演变,文学与史学,教育及教育制度,封建王朝的文化思想政策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等方面。在思潮走向、思想演变方面,本卷论述了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与学术交流、秦汉思想的演变与经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魏晋的玄学与佛道、宋代的新儒家、明代文化的通俗化、晚明哲学与东西文化的碰撞等,从社会历史变动的大背景分析了思潮涌动、思想演变的根本动因,及其与社会政治的互动;文史部分则在反映中国古代文学与史学发展及其特点的同时,着力评估了中国古代文

学与史学的成就,充分体现了它们在中国古代文明以及世界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文学突出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及戏剧等有标志性的文艺形式,还具体论述了《红楼梦》、汤显祖的戏剧以及晚清谴责小说等富有时代气息的代表性作品;与文学相比,史学部分的内容更为丰富,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自身的传统,更因为其“经世致用”的特点对社会、政治乃至教化有着更为重要的鉴诫意义。这一点,从本书对《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等举世闻名的史著的论述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在中国古代,教育不但关系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而且关系到对人才和政府官员的选拔。教育制度是与选官制度密切相关的,所以历代王朝对于教育事业十分重视,而且根据时代形势的变化,对教育实施改革和调整,并相应制订一整套具体的政策。本卷既肯定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对封建王朝强盛和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肯定了教育制度如科举制度、书院制度等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才选拔制度在世界文化史、教育史上的地位,也揭示了这些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弊端。

《社会卷》是将中国社会史作为史鉴专门著

作的首次尝试。中国历史上各个发展阶段的阶级与阶层、社会群体、社会生活与一切社会化活动乃至各种社会问题,都是此卷所关注和着力探讨的内容。如先秦的宗法制对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格局有着深远而重要的影响,秦汉之际历史大变动导致的社会层面新格局,以及秦汉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阶层和集团,如游侠、流民、同姓诸侯王等,也是重要而有趣的问题。魏晋南北朝部分则论述了“士庶天隔”的门阀与等级,具有坞堡壁垒特色的社区。隋唐与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发生大变动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阶层变动的分析,对于认识古代中国的国情是至关重要的。明代则主要着眼于流民、商人和士大夫阶层,以及明代晚期社会风气的嬗变。清代则深入剖析了官府的吏员、八旗子弟、流人及帮会。值得注意的是,本卷的各篇文章,依据社会结构与社会层面的基本分析,还对各个社会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特别是当时统治者处理这些问题的政策和措施,以及这些对策在实施过程中的成败得失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检讨,诸如交通问题、流民安置、灾害对策、婚姻问题、家庭问题、宗教问题、吸毒与禁毒、道德风俗以及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的分析研究，对于今天有很强的针对性。读了这些文章，可以得知，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些社会问题，其实在历史上也都存在过。了解这些问题的产生和演变，特别是检讨一下前代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对策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无疑是必要的。

(二)

在酝酿和编撰《资政要鉴》的过程中，我们再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确实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遗产。从史鉴的角度来说，一些基本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历代封建王朝治乱更迭、兴衰存亡的漫长过程中一再复制，并经受历史的检验。“今不虑前事之失，将复循覆车之轨”，这些内容格外值得我们重视。那么，在“鉴以资政”的思想指导下，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进行思考、总结，历史上哪些鉴诫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呢？我认为，以下八条是应该牢牢把握住的。

其一，要维护国家统一

中国有五千余年的悠久历史，封建王朝的历史也有二千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经

历了许多次政权更迭。从单个的封建王朝来说，从创建到衰亡，短则一二十年，长则二三百年；然而旧封建王朝的衰亡常常成为新王朝崛起的历史机遇，封建王朝的体制在承袭中不断创新和完善。封建王朝的长期性与个别封建王朝更迭的频繁性，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些个别封建王朝，既有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也有大一统封建帝国崩溃之后建立起来的区域性政权；既有以汉族为主体、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封建王朝，也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在中原或周边地区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或地方政权。有人根据这种情况，认为中国历史发展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综观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则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首先，在中国历史上，分裂是暂时的、局部的，而统一是长期的、绝对的。这一特征，即使在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和动荡时期也表现的十分明显。在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各个地方政权存在的时间或长或短，但总体上都是十分短暂的，而这些地方政权所实行的仍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体制，所学习的礼教文化仍然是以儒学为主的中原文化。分裂时期许多少数民族政权都经历过“汉化”过

程,而不少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更是高举统一大旗,以统一中国为己任,其中不但有奉华夏正统的汉族统治者,更有被视为夷狄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如三国时期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魏晋南北朝时期苻坚为统一中原所作出的努力等等,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所以,从中国历史过程的本质而言,统一是主流。其次,从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而言,统一是方向。每一次分裂与其说是大一统的破坏和终结,倒不如说是统一的重新整合。分裂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经济的发展,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同化过程的加速,都为下一次统一准备了条件,夯实了基础。每一次大的分裂之后,又都重新建立起大一统王朝。例如战国之后建立的秦汉帝国,魏晋南北朝之后出现的大唐帝国,五代十国之后出现的宋朝的统一以及元、明、清的大一统帝国。在这种历史轮回中,历史不是倒退了而是前进了,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不是分崩离析,而是再度辉煌。第三,从民心向背来说,广大民众反对分裂,厌恶分裂,向往统一,支持统一事业。在中国民众的理念中,大一统被看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

通谊”^①。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民心向背决定了历史的基本走向。西汉初年,在一片讨伐暴秦的声浪中,青年政论家贾谊高屋建瓴地肯定了秦朝统一六国的历史功绩。秦并海内,南面称帝,而“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这是因为秦始皇的统一是“势所居然”,大势所趋,是因为“近古以来无王”^②,百姓期盼结束分裂,重归统一。清代康乾盛世出现的大一统局面,更是全国各民族要求统一、向往统一的结果,土尔扈特部的回归则是最有力的证明。第四,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载体。没有统一和统一的整合,生活在中国版图中的各个民族就不可能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乃至同化,从而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和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总之,统一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没有统一,就没有今日的中国,也就没有中国的未来。第五,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是历代封建王朝乃至全体民众坚决维护的基本目标。清乾隆帝曾明确表示:“既不无理强取他国寸土,亦决不无故轻让我寸土于人。”^③

① 《汉书》卷56,《董仲舒传》。

②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501页。

其二,要保持社会稳定

有些人看到中国封建王朝历史的长期性,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超稳定结构”,过多地指责这种长期性、稳定性给中国历史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些人甚至别有用心地宣扬中国社会“停滞论”,认为中国如果不借助外力,就不能够发展。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它抹杀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古代世界乃至中世纪,版图广袤的大帝国并不少见,然而它们的兴起和衰亡有如狂飚一般,常常成为历史舞台上来去匆匆的过客,而以此为载体的一些古代文明也随之凋落。反之,中国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在衰亡之后不断得以重建,而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大一统国家版图的奠定、特别是中华文明的繁荣兴盛以致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决定中国历史基本面貌、长期影响并将继续影响中华民族发展的基本要素,都是在长期统一和安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

人类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在阶级对抗中走过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它的统治对象是广大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不是或主要不是在对抗的历史环